

符号学译丛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馈赠现象涉及动机、情感、互惠、契约以及道德等范畴  
囊括人类学、文化、社会、历史等领域  
是一个万花筒一般的意义生成结构

## Schenken: Zur Anthropologie des Gebens

# 馈赠的社会符号学

〔德〕赫尔穆特·贝尔金 / 著  
魏全凤 廖洋昇兰 /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馈赠现象涉及动机、情感、互惠、契约以及道德等范畴  
囊括人类学、文化、社会、历史等领域  
是一个万花筒一般的意义生成结构

Schenken:  
Zur Anthropologie des Gebens

# 馈赠的社会符号学

〔德〕赫尔穆特·贝尔金 / 著  
魏全凤 廖洋昇兰 /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颖  
责任校对:石旭 张伊伊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馈赠的社会符号学 / (德) 赫尔穆特·贝尔金著;  
魏全凤, 廖洋昇兰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2

(符号学译丛 / 赵毅衡, 唐小林主编)  
ISBN 978-7-5690-0270-6

I. ①馈… II. ①赫… ②魏… ③廖… III. ①社会学  
—符号学 IV. ①C91-05②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2438 号

Helmuth Berking: Schenken; Zur Anthropologie des Gebens

© 1996 by Campus verlag GmbH, Frankfurt, German.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6-313 号

书名 馈赠的社会符号学  
KUIZENG DE SHEHUI FUHAOXUE

著者 [德]赫尔穆特·贝尔金 (Helmuth Berking)  
译者 魏全凤 廖洋昇兰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90-0270-6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张 11.25  
字数 201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 前 言

放眼当今世界，人们不禁感到自己正经历着一场社会巨变，这一过程既艰辛痛苦又危机重重——日常生活受到威胁，福利国家的基本权利（basic entitlements）停滞不前，就连不久前被冠以先锋称号的世界观与身份建构也逐现疲软，注定要埋入历史的烟云之中。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宗教内战重现欧洲中心地带，世界经济大萧条，议会民主制危机到来，生态创新技术匮乏——所有这些仅是整体故障中的寥寥几笔。在 20 世纪即将接近尾声之时，乐观主义没有容身之地——大规模裁员每天上演，社会和平“危在旦夕”。在充斥着心理社会剥削的语境下，落后的右倾民族主义抗议运动气焰嚣张，它侵蚀着文明的标准，或促使人们将之无情丢弃，而教育工作者们除了感到惶恐不安和进行软弱无力的理论推导外，也束手无策。对政治的冷漠和埋怨以及彻底的功利主义促使社会产生了道德共识，它以公共福利和集体责任为导向，与众多特定利益融为一体，而这些利益的规范性要求似乎只有一个构成因素，即保护个人利益。

每日议程上此类事物众多，鉴于此，本书要讨论的馈赠现象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当有人对现实的残酷视而不见，隐居于古老乏味的田园生活，并以不合逻辑的形式与外界交往时，人们可能很容易就感到疑惑。当我们共同的家园硝烟四起之时，我们何须再去理会那些再寻常不过的事呢？我的大致回答是，因为无偿的馈赠与接受行为不仅在量和质两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承载着与现代社会道德建构问题密切相关的语境化形式和归属原则。

馈赠意味着获得权力和进行符号交换；意味着赋予权利和义务以及主动建立关系和寻求联合；意味着将主观意义客观化，并系统地将他我进行分类；意味着将他动机中的战略、战术包装美化，使社会挑战看上去像单纯的慈善行为；意味着荣誉与羞辱、等级与阶级、团结一致、关系亲密与彼此

认可；更意味着平等与亲近。本书的主要思路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馈赠这一矛盾结构的道德潜力和综合潜力进行分析，借此希望对人们熟悉的事物进行阐释和重新整合，以给读者带来启发。

在大致了解了第一部分关于馈赠在当下的动机、场合和情感规范后，第二部分将检视那些被遗忘了的社会理论维度。在这些维度中，礼物交换仍然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结构。本部分主题为馈赠和接受，内疚和债务，互惠原则和人际关系中的文化创造，符号暴力契约以及社会融合的生成模式——以上所述均发生在古代祭祀和神圣仪式分配中，起着稳定交际圈的作用。与陌生人交往形式的改变以及“待客”的制度化最终为馈赠的人类学卯定了起点，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认为，无条件的馈赠（和接受）不仅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基本而有效的活动，而且是建立古代社交中的符号秩序和道德词汇必不可少的实践基础。

在第三部分，本书将基于文明论和知识社会学视角，沿着调解的矛盾模式方向继续进行阐释——本部分将讲述传统馈赠道德思路的中断和“个人利益”历史生涯的开始。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中固有的经济、文化的分裂，馈赠将最终超越必然王国，进入“不值价、不划算”的经济领域，这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一领域。馈赠摆脱了传统的限制，在交互作用的反身认知成分的作用下，其矛盾的结构变得透明可见。这引起了人们对馈赠的质疑，认为它既有可能从属于个人利益的战略定位，又有可能（假设以规范性特征为己任）与资产阶级个体的个人理想和主体形象相冲突。

在资产阶级社会早期，经济和文化的分裂主要通过文化规范和道德责任对经济领域的个人利益和市场预测进行限制。尽管如此，在当下，社会学的论断强调，超功利主义道德的各个方面将不再受任何文化框架的压制——因为超功利主义道德本身就存在于主体参照的生活世界中，其本身拥有的力量足以将这一道德变得支离破碎。在此背景下，本书的第四部分将尝试对个性化和共同利益取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概括，其重点在于“个人主义团结”这一先决条件。在当前社会科学话语中普遍存在的概念指向多样化的现象背后，在将民间宗教（民间团体概念化）或者社群的特殊主义作为参考的多种尝试背后，它们共同拥有着某种为世人所认可的东西。那些被冠以馈赠头衔的老问题再一次明确无误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变成了当代社会道德经济、分配公平、社会连带以及相互认可等问题。令人遗憾的是，馈赠的人类学视角并未被充分利用来批判性地看待当代社会状况。但正因如此，本书才变得与

众不同。

没有厄斯·贾基 (Urs Jaeggi) 的关心和坚持, 这项研究将无法完成。加比·阿尔特豪斯 (Gaby Althaus) 和约尔希姆·默比乌斯 (Joachim Moebus) 给了我与他们共同切磋本书初稿的机会, 他们的点评令我颇为受用, 我非常感激。汉斯-乌尔里希·特莱希尔 (Hans-Ulrich Treichel) 和西格哈德·内克尔 (Sighard Neckel) 总能在我表述主题时以精彩的文字给我带来惊喜。汉内斯·卡莫兰德尔 (Hannes Kammerlander) 将电子字符转化为书本文字。在此, 我向他们所有人, 为我们多年的情谊和合作表示感谢。

最后, 我还要特别向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罗伯特·瑞杰克 (Robert Rojek) 和帕特里克·卡米勒 (Patrick Camiller) 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使这本书的英译本得以出版。同时, 我还要感谢德国跨国基金 (Inter Nationes) 对本书的部分翻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

赫尔穆特·贝尔金

# 目 录

第一部分 馈赠的现象学	( 1 )
1. 动机	( 3 )
2. 场合	( 12 )
3. 情感规则	( 22 )
第二部分 馈赠的人类学	( 31 )
4. 礼物	( 33 )
5. 祭祀	( 53 )
6. 祭品分配	( 68 )
7. 命名	( 81 )
第三部分 变迁	( 113 )
8. 理想结构	( 115 )
9. 超越必需	( 128 )
第四部分 道德与社会	( 141 )
10. 个性化与公共福利	( 143 )
11. 个人主义的团结	( 150 )
参考书目	( 157 )

## 第一部分 馈赠的现象学

时值午夜前夕，派对正走向高潮。仍有客人陆续到场——来这儿的都是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所有人都笑脸盈盈，他们衣着得体、相互问候，派对的女主人正庆祝她的33岁生日。一小片空地被腾出来放置礼物。临近午夜之时，这片空地终于派上了用场，桌上的礼物堆得满满当当。绝大多数礼物都用彩纸精致地包装过，束着亮晶晶的丝带，还有心形或星形的饰品，有的还写着一些诙谐俏皮的祝词。客人们或是推杯换盏，或是随音乐起舞，或是驻足观看。关键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的生日派对按计划准点进行。女主人打开香槟，宣布晚会开始，然后开始招待客人。

礼桌旁一阵轻微的骚动过后，起初混乱的人群终于井然有序地排成了一列。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排列的顺序蕴含着一种等级结构，排列的位置意味着来客与女主人关系的亲密程度。靠前站着的是她的现任恋人、女伴和姐妹；接着是她的前男友和可能成为男友的朋友，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排在一起；排到最后的是准备送上生日祝福的朋友的朋友。这场派对最有意思的是馈赠环节。左亲亲、右抱抱——汪达女士做得非常好。她享受着这一刻，心满意足。收完礼物后，就轮到拆礼物了——“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是什么了”她进行着诸如此类的猜测——拆掉礼物包装时，女主人开心的惊叹声意味着她对礼物十分满意。这样，送礼物的人可以驻足在女主人身边，享受片刻的瞩目，直到这一互动仪式结束。拆掉一份礼物后，客人们

议论纷纷，这时，又该轮到下一个人馈赠了。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馈赠结束后，汪达女士精神大减，略显疲倦，瘫软在扶椅上。地板上散落着绳子和丝带，桌子上堆放着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礼物。人们跳着舞，喝着酒，一边闲谈，一边计划着消遣晚上余下的时光。总而言之，这场派对让人感到非常愉快。

酒醒后，早餐要比平常晚很多，女主人最好的朋友们还在，昨晚发生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不同客人留给她的印象以及他们送给她的礼物的确让昨晚的回忆增色不少。多年前的恋人带来的香槟竟然如此廉价，如此没有人情味；而另一人送的香艳的内衣看起来带着无以名状的粗鲁、暧昧；F先生根本没来，这让她心中不快。以她和昨天参加派对的人的关系来看，这些礼物含沙射影地想要表达的意图让她既不痛快，也不反感。那么，是什么让她如此开心呢？

无论如何，她现有的关系网络已经在这顿早餐的闲谈中粗略成型。这就好比确定那场派对等级的顺序一样，只不过稍稍做了些修正。母亲送钱当礼物并不合适，但汪达女士总是手头拮据，所以这笔钱能让她过得轻松些。浪费的饮料和自制菜肴都不算什么，最让人吃惊的还是送的这些礼物明显不实用。比如那些小摆件，可以说，明天她就会将其忘得一干二净，然后丢落在个人杂物堆的某个地方，直到多年以后家里进行大扫除将其清理出来时，她才会回想起当年生日派对的画面。

## 1. 动机

馈赠者方能教授馈赠。

通过开篇故事，相信大家已经对馈赠在当下日常实践中的全部主题有了一定的了解。馈赠对于人们来说可谓再熟悉不过的现象了。每个人都知道馈赠，并且或多或少地生活在馈赠或接受礼物的环境下。当然，每个人也都记得与这种交互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风险和无法估量的因素。

这种交互形式的历史本身就古老而悠久。至少在马瑟·莫斯（Marcel Mauss）率先发表《馈赠》（1925）一文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交换礼物是一种原始的社会现象。古代社会通过制作礼物、交换礼物的特殊形式对社会本身进行再生产。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当下的交互形式恢复了纵横于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相同馈赠仪式。送出物质性的礼物、正式接受礼物、证明自己的感激——这三个步骤构成了礼物的交换，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差异巨大，且大多数礼物交换总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同样，公私分明的历史观加深了政治表达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差异，日常认知也是如此（它同样一本正经地存在于市场关系和个人关系之间，系统地对资本主义的交换原则进行了否定）。在当下，礼物几乎完全进入了人际关系的范围：礼物所指的主要是一种文化习惯，如果调换位置进入政治或经济范围，它就会立刻引起丑闻。此时，礼物将很大程度上不再是通过交换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再生产的部落和宗族问题了。确切地说，个体在个人基础上进行自我再生产，并通过分配私人资源，赠予令人愉悦的礼物，将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馈赠和礼物因其最为多样的意义属性交织在一起。即便如此，这也并不代表着两者的行为结构就是相同的。“资产阶级馈赠文化，作为个人、家庭和朋友关系的表达，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Hannig, 1986: 150）早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馈赠文化就已不再受资产阶级道德的局限，并基本完成了在社会上的普及。为测量馈赠和礼物在文明史上拉开的差距，运用人类学和民族文学中常用的解释模式会显得十分

吃力。该模式以探索物质基本结构为目标，认为古代礼物交换的基本形式可被直接运用于解释“当代”的关系。<sup>①</sup>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礼物”的最新定义，通过这一定义我们应能看到文化框架和情景语境（简而言之，就是意义的社会结构），而这一文化框架和情景语境应能适应个性化的矛盾动态和现代社会的去传统化特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场真正的有关文化史的延续和破裂、意义的改变和创造、新出现的特点和缩小的差异的辩论才有可能进行。

礼物的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尚显稚嫩。<sup>②</sup>其主题范围涉及文学研究与法律研究、民族学与民俗学、市场调查和消费调查；此外，还涉及社会心理学和利他主义研究以及家庭社会学和社会政策领域中的重要方面。对于礼物的话语特征，社会理论维度在面对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化时，也显得不堪一击。这一结果让人十分吃惊，因为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当年曾尖锐地指出，由于差异巨大，馈赠已被排除在了交换的客观规范之外。在他看来，礼物——在与和财产转让有着直接联系的交互模式相结合时，就显示出了“社会学意义丛”（sociological constellations）的最大价值，因为馈赠者与接受者的态度和地位纵然带有个体上的细微差别，但也会以多种形式融为一体（齐美尔，1958：370）。然而，在众多的社会学组合中，另一点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即如果人们不仅把礼物当作无偿的财产转让，而且还将之作为建立互惠关系和社会评估的可靠标志。那么，除了调节市场规律以外，调节社交礼仪的规范导向和道德观念也必定纳入人们的观察视野当中。

馈赠的语言就是传统道德的语言。它能让我们特别清楚地探索现代社会的“道德经济”、调查契约建立的非契约前提，以及挖掘每一种制度的非制

---

① 马瑟·莫斯（Marcel Mauss, 1990）早在其书中提到过古老的交换和现代礼品经济的交融，但其界定是有局限的：一方为分析他在另一方中的缺陷提供理想的结构。然而，对结构人类学最前沿的代表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而言，理论程序并不需要这一差异来发挥作用。伯哈德·劳姆（Berhard Laum）在其自传《馈赠者的经济》（*Schenkende Wirtschaft*, 1960）中也通过假设连续性进行引导。从发展“礼品经济”的角度批评了人类学范式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论述（Cheal, 1988: 2f.）。

② 照我看来，齐美尔（Simmel）是第一个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馈赠的符号学框架的人。这一主题本身就获取了尤其是英美研究中的某些特定的东西（Schwarz, 1967; Titmus, 1971; Caplow, 1982; Cheal, 1986, 1987, 1988; Camerer, 1988）。在德国的研究中，可见萨勒（Sahle, 1987）和吉塞拉·克劳森（Gisela Clausen, 1991）根据交换原理图式的论述。

度框架 (Thompson, 1971)。馈赠的符号学, 即一门提供极具前景的跟踪方法的学问——在这一方法中, 知识背景引人反思, 生活形式层出不穷——包括关系的萌生和体制化、互惠原则的交互调节以及主体表达行为和集体责任感中的文化转向。

礼物交换的情景结构十分复杂。它至少由四部分组成: 礼物本身, 馈赠和接受的行为场景, 施动者自身对所赠物品、行为结构和行为目的的理解, 控制交互伙伴表达行为的“情感规则” (Hochschild, 1983: 65f.)。此外, 还应该增加语境变量因素 (如被视为社会框架的情景、地位和性别的不同定义), 主体间的意义生产于此, 因此这些变量不可避免地成了定义的主体。从密友到熟人, 从爱人到教母, 馈赠得到的回应是不同的。对某部自传烂熟于胸并对之采取优先阅读态度的人, 会对自传产生迫不及待的期待, 他们渴求表达并要求满足这一愿望。越是靠近这一目标, 人们就越能明白什么是“恰到好处”——但越是靠近, 人们“失言”的风险也就越大。旁观者能在通用的符号下寻求庇护, 所用的鲜花、美酒和糕点起着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作用。但若是朋友或爱人, 就必须为之绞尽脑汁, 甚至从细枝末节中找到这一愿望。

赠礼, 如同问候道别、手势交流、寒暄致意一样, 是一种践礼, 通过这种践礼, 人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传达并维系这一关系的当下价值。礼物起着“关系信号” (Goffman, 1972a: 248) 的作用, 是一种表达爱慕、关心和信任的常用手段 (Cheal, 1986: 424), 同时, 还表现为规范思想的外化和对品味的判断 (Schwarz, 1967; Caplow, 1982; Cheal, 1988), 它承载着有关馈赠者和接受者的讯息。礼物使得道德规范有迹可循; 从某种意义上讲, 礼物是一种情感, 目前看来, 这种情感将牢牢地存于记忆当中, 因为礼物在构成上, 与特定时期的历史相关, 也与特定个体相关。

在礼物中, 人们的自我形象和他人印象在本质上呈现出一种物质形态。但如果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身和他人的完美形象, 那么他就必须预料到, 在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难免滋生出来的战略性模糊和矛盾效果。比如, 给“男孩儿”或“女孩儿”的礼物——玩具机关枪或芭比娃娃——这些礼物所传达的不仅是父母的想象和期望, 而且还充当了分配和确认性别身份的重要手段 (Schwarz, 1967: 1f.), 分发给孩子们通往未来勇敢战士和甜美公主的“入场券”。

之后, 礼物作为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的客观化呈现, 对馈赠者和接受者

双方都起到了启示性的作用。特别是当第三方在场时，礼物通常成为个人身份的承载和挑战。它外化和展示了符号分配，并公开建立了与他我的自我认知不相符合或不相贴切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尴尬处境”的由来（Dreitzel, 1983）。随着本真性和自我实现渐渐成为衡量人格面具和主体性形象的理想标准，自我参照和自我呈现就需要获得文化规范的地位。有了这一地位，人们就能忍受由自我牺牲所带来的断臂之痛。当下，馈赠普遍与自我参照和自反性知识密切相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馈赠的涵义也与早期的动机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早期，赠礼的自我参照和自我呈现与自主生产和职业角色是一致的。因此，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将这种理想状态描述为：

诗人创造了诗歌，牧人带来了羊群，农夫生产了玉米，矿工凿出了宝石，水手捞起了珊瑚和贝壳，画家创作了画作，而小女孩则亲手绣出了手绢。当一个人的人生写照通过礼品传达出来时，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幸福美好，因为，正是它们还原了社会伊始的基本面貌。但是，当你进入商场为人挑选礼物时，如果它不能呈现出你缤纷的人生和出众的才华，而仅仅暗示着紧张、枯燥、乏味的人生，那么馈赠将只会成为一场冰冷无情的交易。

当下，这样的场景因过于单纯而显得不切实际。律师、工人和退休人员怎样才能展现出他们的生平事迹呢？正是在一个受质疑的，与使用价值十分契合的工艺和农业生产时代，个人物品才能被制作成礼物，因为这些物品不会在市场上销售，而是直接送给重要的人。在此背景下，礼物和赠礼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了。当所有人都送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礼物后，礼物所传达的信息难免会出现局限性，这是因为，这些物品的符号价值是单一而又明确的。社群本身十分尊敬社群中拥有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个体成员，当所有成员互赠商品和其承载的社会价值时，社群就会保护自己的道德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没有空间去耍弄模糊价值、符号多义性、不确定的分期和给人惊喜的戏剧做法。身份争夺仍行于安全轨道，在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在送礼的行为而非从礼物本身得到展示。

只有在自我外化和他人外化相互作用时，才能让起着礼物作用的商品表现出作为涵义载体的多元素性和多义性。在自我外化和自我参照的前提下，馈赠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政治学，一种“印象主义管理”和自反性，它和策略

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他人的理想化形象有着独特联系的纯粹“身份认同”（Goffman, 1972b: 92）则可能成为另一个极端。无论如何，亲密关系的鉴别需要以下两种证据：与馈赠者有关（当然得发自内心），与接受者有关。

一方面，敌对的态度即使变成了形式上弱化的讽刺，也可以通过馈赠表现出来。即使是迂腐透顶的书呆子，在面对荒谬的办公桌摆设时，也不得不强颜欢笑。独裁专制的行政长官在看见自己被设计成一群锡制玩具兵的总指挥时，也会气得食不知味。当文员收到同事郑重地送给她的吊床和男用拖鞋时，这其中的含义已经不言自明。这些问题都十分明显，但这些动作的发出同时也为暗示绝交和处理尴尬、羞辱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另一方面来讲，明显故意的敌意行为或伤害接受者自尊的夸大陈词，也会导致两者交往关系破裂，使不友善的行为层层升级。馈赠者损坏礼物会引人反感，因为他们的关系符号与物品的真实状态并不对等。愚弄接受者的时间结构有着特殊的意义（Bourdieu, 1977: 171）。因此，通过直接摒弃责任感，即时互惠否定了交互关系的馈赠形式，而这一责任感正是其特有的意图所在。与此同时，这种完全失败的交互行为使得对方的不确定成了个人娱乐的来源。通过过多或过少的馈赠来违反互惠原则，可能会被用来纠正馈赠者对馈赠情景的定义。

然而，任何回应都可能对动作发出者不利。负面效应是符号实践的典型危害——尽管它囊括了人们能够想到的所有动机、意图和利益——然而，矛盾的是，它还与我们在日常意识形态中的同情心、信任感、团结思想和互惠原则息息相关。当有他人在场时，那些拒绝接受起和解作用的礼物的人，就很容易被冠以“铁石心肠”的称号；而馈赠过于频繁的人，又会让人怀疑他是否在收买对方；从不赠礼的人则会被谴责为吝啬鬼。<sup>①</sup>

当接受者按照自身所理解的馈赠情景接受礼物时，将不可避免地用语言表达出馈赠者无意追求的效果，如果人们将赠礼的视角扩展至此，那么干扰范围将变得清晰可见（Caplow, 1982: 1314）。比如说，不合身的衣服总是会让接受者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又或多或少会带有一些讽刺和酸楚：“哦，天啦，我没这么胖吧（或没这么瘦吧）”，诸如此类。儿童和少年常常会对这

<sup>①</sup> 潘多拉——就字面而言，可能被认为是造物主开启了恶意的图腾。当下，在几乎所有文化中，用于减小馈赠风险的仪式的防御机制以及预防措施，已经被批判性语言策略、辩护冲动以及对他人动机的严格询问所替代。

样的物品采用敌对策略，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还不够成熟。有时候，馈赠者的反应会慢半拍，尔后才意识到他们做错了——送出的礼物一件件地消失，或是对方从不佩戴自己赠送的首饰，又或是送去清洗的套装第一次就被对方忘在了洗衣店。失望的风险总是居高不下，而在每一个不寻常而又相互冲突的馈赠情景中，一大堆名言警句和至理名言总能派上用场。那些对于收到的礼物绝不挑毛病，对送出的礼物也绝不求感激的人被证实缺乏乐趣，而这是一种常识问题。当然，通过社交行为表达自身影响力的教育目的背后，模糊价值出现了，它的出现伴随着无偿的馈赠和接受<sup>①</sup>，伴随着亦敌亦友、自私与利他动机的共存，这些都赋予赠礼以繁重的责任和道德善行的反面情感价值。但是，在此文化背景下，消极动机大多否定行为表达，除非人们能够提前预料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押上自己的纽带关系。

馈赠与接受不仅是个体行为，还是人们在维系互惠关系和巩固社会关系时所启动的触发机制（Gouldner, 1975b: 227f.）。馈赠以道德取向为前提，而这道德取向又能通过交往双方的互补性角色分配和情景差异来保证双方的互惠关系。在莫斯的经典解释中，礼物的积极贡献被包含在馈赠、接受和互惠三项职责中，这三项职责以启动辩证的符号权力为目的，在不断转换的角色中，施动者遇见并认识对方，将他们交替辨别为债权人和债务人（Mauss, 1990）。分配公平并未朝着负债程度和免除债务间的最终平等发展，而是朝着其间的暂时平衡迈步。礼物的全部意义仅在“交替”的整体中得到体现，而每份单独的礼物，却在地位相等的人群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馈赠者赠送物品，并向接受者发出感激的义务，必要时，馈赠者还会将这一感激之情赋以物质意义。根据权力理论，出于情景要求，某一方的道德优越感和对方的自卑感在程度上是相等的。馈赠者会牺牲部分资源，而接受者也无法摆脱自己主动权会沦为被动权的疑虑。为何馈赠会在当代社会拥有积极内涵，而接受却被人们喜忧参半地予以否决？不平等的符号权力情景分布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话语分裂相当于不平等的角色分布。当人们被问及为什么要馈赠时，他们会提到关爱和友谊，关心和关怀，信任、尊重以及欣赏（Cheal, 1987, 1988）。但当被问及接受

<sup>①</sup> 礼物交换的本质为不友善提供了条件。尽管馈赠本身就是种报答……它还明显伴随着剥削，因为馈赠者向接受者呈现的礼物也可以自我满足。当他收到别人回赠的礼物时，他在物品和金钱的收支控制中或多或少会有些损失。就此而言，接受者变成了剥削者。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的矛盾情绪都有可能存在。（Schwarz, 1967: 5）

礼物的感觉时，他们表现出的欣喜中总会夹杂着一丝不安和疑虑。

通过礼物交换而定义的社会邂逅在受仪式控制的固定框架内运行。这一交互形式的隐性知识早已预定了下一步的行为：一方应当对另一方表示尊重，展示礼物后，接受方应当接受礼物，然后表示感谢，又或者每一个动作顺序都以完整的互惠精神表现出来。

在礼仪方面需要多加注意。光把礼物置于一旁是不礼貌的。馈赠者将强制性的行为传递给了接受者，而这一行为的现阶段任务就是完善处于不确定阶段的交换仪式。拆开礼物的行为能够帮助提升这一馈赠情景的戏剧强度，归根结底，其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礼物的谜底。<sup>①</sup>在其中所隐含的审美要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使小小的礼物“高大”起来，使微小的细节显露出真情；它强调了馈赠者对礼物倾注的时间和精力；它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展示礼物和拆开礼物的动作上，正是这些动作为合理构建馈赠情景创造了足够的时间。接受者调动了所有合理的、不确定的情绪，他可能会显得紧张和好奇，在笨拙地拆开礼物时，又可能伴随着惊喜和喜悦，这时他的情绪也达到了高潮。那么，儿童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对他们来说，拆礼物就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好奇心和占有的冲动，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了一种暗示——成年人不能拆这些礼物，否则就会被人们嘲笑。成人要求表现出既按捺不住又得按规矩行事，既好奇又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样子。

由于馈赠的戏剧性、阶段的不确定性及其给人带来的忽强忽弱的紧张感，所以其不仅是一种与日常生活相抵触但深受青睐的文化实践，而且还是一种典型的“孤立”现象（Schwarz, 1967: 10）。随着礼物的拆开和紧随其后的道谢，这种交互行为也走向了高潮，然后便立即谢幕，馈赠骤然陷入世俗常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为了给不确定性阶段和惊喜创造恰当的发展框架，聚会和节日便充当了情景形式，进一步加强了礼物的凝聚力。然而，在我们考虑社会场合和典型场景之前，令人不安的问题（因为多少会有些荒谬）仍然存在，那就是——礼物究竟是什么？

法律定义对此不起作用，而“捐赠”在人们看来是一种无偿的支出。那什么才能被称作礼物呢？要对行为和背景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让某个物品、某个茶壶或者某本书转变为礼物呢？

---

<sup>①</sup> 物品“精美”的包装，圣诞节期间高档商店自然会提供，且变得越来越职业化。令人毫不惊讶的是，在民族传统的前提下，日本已经在这一方面先行一步，创建了专门进行艺术包装的公司。

从工业产品到符号商品的转换过程以及带有主观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介于饱受争议的万物有灵论和公然的拜物教之间）的物品的个性化过程，其早在物品离开市场落入消费者手中时就开始了。<sup>①</sup> 如果按照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说法，认为物品不仅是生活资料和区分手段，还是各种文化当中最为突出的（因为能被肉眼看见）一部分，那么消费的本质就在于集中构建绑定礼物内涵的能力。“忽略对消费者非理性的想法，忽略商品是可吃可穿可避寒的物品，即忽略商品的实用性，并尝试将商品看作利于思考的物品，看作培养人类创造才能的非言语媒介。”（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 62）

各式各样的菜肴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准备，餐桌服务水平也明确了这一场合的特殊性。女士们的黑色小礼服，就像香槟和柑橘果酱一样，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礼仪，作为传统符号系统在此出现，“构建了这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定义”。这一构建越有效，重要的商品就越能融入这些仪式表现中，就越能被细化为特定的意义载体。“仪式服饰越昂贵，我们就假定其强化仪式内涵的意图越强烈。从这一角度看来，商品就是仪式的附属品，消费则是一种仪式过程，这一过程的首要功能是使早期发生的事件便于理解。”（ibid., 65）

因此，在馈赠仪式中，大众产品被转换为至高无上的符号商品。这一礼物和所有仪式物品一样具有某些共性：能组织记忆，能使感情更为具体实在，还能发出关系信号。人们普遍认为，馈赠仪式是一种矛盾事物的个性化形式，而馈赠本身就是直截了当的个性化。购买和销售中发生的物品交换，不仅不能进行单向操作，而且在进行系统操作时也是行不通的。从馈赠的符号框架中退出的价值尺度——正是金钱在特殊情况下可作为适当的礼物被人接受的原因。礼物，特别是众所周知的用以维持友谊的小礼物，其实不必非得实用，因为它们的价值并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的性能特点在于“非必要性”，在于对必要性的严格否定、有目的地利用物品，以及倾向于纯粹占有的价值观。

如果符号实践要求通过否定市场关系获得自己的具体含义，那么这一符号实践就必须确保能够消除所有因利益和欲望引起的对礼物含义的破坏。没

---

<sup>①</sup> 对该方面系统化忽略的消费主义批判，尤其要参考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1990）的研究成果。